臺大歷史學報第 74 期
2024 年 12 月，頁 247–257

BIBLID1012-8514(2024)74pp.247–257
2023.11.16 收稿，2024.11.20 通過刊登
DOI: 10.6253/ntuhistory.202412_(74).0006

§書評§

重建政治秩序的暴力——

評 Andrew G. Walder, *Civil War in Guangxi: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's Southern Periphery*

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23, 296 pp.

張 君 龍*

前 言

隨著新史料的出現，近年來已經有不少學者跳出中共中央政治鬥爭的敘述，轉而從地方角度提出對文革的新看法，魏昂德（Andrew G. Walder）就是其中之一。2023 年 3 月史丹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《廣西內戰：華南邊緣的文革》（*Civil War in Guangxi: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's Southern Periphery*，以下簡稱《廣西內戰》），即是他關於文革地方派性的代表作。[1]魏昂德關注廣西問題由來已久，在正式出版此書前，已發表數篇論文及演講，且其自陳此書可能是他關於文革題材的收官之作。[2]

*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碩士生
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；E-mail: junlongzhangmarshall@gmail.com

1 中共話語中，代表個人主義的「派性」與代表集體主義的「黨性」對立，意指個人的派別利益至上，忽略集體利益。此詞泛指文革時期分裂的群眾組織，本來應是一個集體的群眾組織分裂成對立的兩派，即是「派性」的表現。在廣西，「派性」的表現就是「聯指」派與「四・二二」派的對立（詳後述）。

2 Andrew G. Walder, "Anatomy of a Regional Civil War: Guangxi, China, 1967–1968," *Social*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廣西是文革中死亡人數最多的省份，且屠殺部分受害者的方式相當殘忍。這點隨著文革後的一些文學作品以及近年來的研究，已逐漸為人熟知，甚至，由於文革時期廣西出現多起吃人事件，時任軍政一把手的韋國清（1913–1989）還被部分中國網民戲稱為「美食家」。[3]但同時，廣西文革仍是一個充滿疑問的領域：為什麼文革期間廣西的死亡人數比其他省份多？為什麼韋國清始終沒有倒臺？為什麼大多數屠殺都是針對四類分子？[4]廣西的派系衝突如何形成？魏昂德在書中為這些問題提供了詳實的答案。另外，針對書中部分內容，筆者也有些許補充。

一、廣西兩派的形成

《廣西內戰》的第一部分概述廣西兩大派的形成過程，清楚呈現了群眾派性透過文官與軍事系統輻射到全省的圖景。韋國清和其他省的領導一樣，在文革初期的工作組問題上出錯，招致一些學生反對，後被造反的群眾批鬥遊街。[5]但是在南寧奪權後，造反派內部分裂，廣西軍區態度隨之丕變，不再支持先前參與奪權的「造反大軍」。廣西軍區此舉引起部分造反派不滿，一些自治區黨委幹部也參與其中。1967 年 4 月 19 日，伍晉南（1909–1999）、賀希明（1910–1979）、霍泛（1915–2009）發表聲明，三日後，受到軍區壓迫的一方聯合成立「南寧四・二二火線指揮部」（後簡稱「四・二二」），反對韋國清。而受軍區支持的一方

Science History 46, no. 1 (Spring 2022, Cambridge), pp. 35–63. 中文書名由筆者自譯。關於「收官之作」一說，筆者得知於 Andrew G. Walder, *Anatomy of a Regional Civil War: Guangxi, 1967–1968*, LRCCS Noon Lecture Series, Zoom Conference (November 8, 2022).

3 文學作品如鄭義，《紅色紀念碑》（臺北：華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93）。

4 「四類分子」指 1940–1970 年代地主分子、富農分子、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四類人的統稱。

5 「工作組」，指文革初期由各級黨政機關派向學校掌控運動的組織。派遣工作組領導群眾運動是中共以往運動的慣用手段，但文革期間，毛澤東要求直接發動群眾，以往的「領導」這時對學生來說也就成了「束縛」。

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則在 5 月 11 日成立「南寧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」（後簡稱「聯指」），支持韋國清。由此，魏昂德指出，兩派的分裂與文革前的體制性矛盾毫無關聯，不同的政治取向實則為現有政治架構崩潰後的產物。

大規模的造反運動起初只限於省會南寧等大城市內，但是 1967 年 1 月風暴時，全省其他地區的群眾組織也紛紛奪取各級黨政機關的管理權，並在其後的派系鬥爭中劃分為支持韋國清或伍晉南陣營。魏昂德提出，奪權之所以迅速蔓延全省，甚至在缺少學生和工人的縣級行政區也如火如荼地展開，是因為黨政機關的幹部也是造反運動的主要參與者，他們透過文官系統，紛紛在機關內展開奪權運動（頁 56）。這一特點，魏昂德在此前的研究中已有述及：大多數奪權仰賴體制內的幹部，文官系統的崩潰其實是一個自內而外的過程（implosion）。過往的「社會衝突論」認為，派系衝突源於體制的受壓迫者和受益者之間的矛盾。但魏昂德的論點對「社會衝突論」提出了質疑，因為幹部本身就是黨國體制中的受益者，但在文革中卻成為推翻黨國體制的主力。[6]

幹部主導的情況在軍隊勢力介入後出現改變。1967 年 3 月，廣西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，開始了全省性的軍管，廣西軍區迅速接管銀行、郵局、電話局等重要單位，並且透過軍區—軍分區—人民武裝部（簡稱「人武部」）的階層化軍事系統控制全省。同時，部隊在接管過程中也導致了兩派群眾組織的固化，親韋的造反派與廣西軍區及其下屬軍事機構結盟，桂林等地反韋的造反派和不屬於廣西軍區管轄的四十七軍結盟，雙方的合作軍隊涇渭分明。

二、屠殺誰為之？

廣西兩派在支持對象上的對立，很快轉化為兵戎相見，形勢惡化

6 Andrew G. Walder, *Agents of Disorder: Inside China's Cultural Revolution* (Massachusetts: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19), pp. 100–106.

臺灣人學社會學刊

後，兩派被召入北京談判，由中央做出裁決（頁 82–100）。在一番檢討後，廣西軍區的韋國清作為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頭號人物回到廣西。但在北京達成的關於兩派聯合、停止武鬥的協議很快成為具文，因為協議只能通過野戰軍或地方軍區貫徹，而軍事勢力本身就是派系的參與者。[7]此外，在傾向四・二二派的 47 軍撤出廣西後，廣西軍區一家獨大，隨即展開殘酷鎮壓四・二二派。《廣西內戰》的第二部分，探討廣西在 1968 年出現的大量非正常死亡。魏昂德指出，從 1967 年 1 月到 1968 年 5 月底，廣西共出現 14,640 例死亡案例，其中 92%以上發生在 1967 年北京談判結束後，且執行者都是人武部動員的農村民兵。面對人武部和聯指的鎮壓，四・二二派展開反抗，雙方遊行集會，並相互搶奪軍火，鬥爭在鎮壓與反抗之間不斷升級。廣西軍區意識到事態失控，隨即嚴厲抨擊四・二二派，將他們污名化為「反共救國團」，中央隨後間接認可了這樣的指控，在 1968 年 7 月 3 日的「七・三布告」中，[8]四・二二派的持續抵抗被描述為「一小撮階級敵人製造的反革命事件」，廣西軍區獲得進一步授權，從而加速鎮壓四・二二派。

魏昂德在第六章敘述發生在廣西農村的屠殺，並對蘇陽的研究提出意見。蘇陽師從魏昂德，他早先關於廣西農村屠殺的研究認為，農村的屠殺不是因為派系衝突，而是對四類分子的迫害，且參與者多為農村平民。[9]對此，魏昂德指出，蘇陽所用的材料多是從地方志中提取的數據，很少述及村級的派系衝突；如果根據改革開放時期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報告材料（以下簡稱「處遺材料」），就能看到農村地區並沒有遠離派系鬥爭。根據魏昂德的統計數據，在廣西各縣的被害者中，四・二二派成員的比例高於四類分子（見頁 123 表格）；此外，參與屠殺的主導者

7 此處參見中共中央、國務院、中央軍委、中央文革，〈關於廣西兩派促進革命大聯合十條協議的批語〉（1967 年 11 月 12 日），魏昂德書中已提及，出處略。

8 1968 年 7 月 3 日，中共中央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、中央軍事委員會、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就廣西柳州、桂林、南寧地區武鬥問題發布「七・三布告」。

9 Yang Su, *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* (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11), pp. 1–34.

臺灣大學

多為基層的軍政負責人，如農村的武裝民兵，與蘇陽的觀點不同。再者，屠殺發生時間與當地革命委員會的成立緊密相關，顯示屠殺實為在建立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，動員地方軍事系統而生的暴力。

魏昂德在最後一章探討影響屠殺的因素。首先，以往研究認為，廣西屠殺與該地複雜的民族構成和客家人的移民歷史有關，但是處遺材料的敘述和從中提取的數據，並未顯示上述情況；反之，發生大規模死亡的地區，幾乎全是漢族人口佔多數。其次，本章分析的另一個著重點是廣西偏遠的地理位置。蘇陽認為，偏遠地區受到中央權力的影響較小，所以集體暴力容易失控；魏昂德卻根據統計數據得出相反結論：越是處在權力末端的地區，死亡率越低，而黨政機關配置越完備的地區，死亡率則越高。

那麼廣西為什麼會出現異於全國的大規模屠殺？魏昂德認為關鍵是廣西地方政治形勢的發展、納入黨國體制且組織嚴密的軍事系統，以及廣西獨特的地緣政治。廣西是中共援越抗美的中繼站，韋國清與越南的關係導致他極不尋常的留任；同時廣西軍區提交的報告作假，將四・二二派打成反共組織，並展開殘酷鎮壓，而後中央的「七・三布告」又加劇這一進程。廣西與其他地區之別，乃因該地高度組織化的軍事系統在文革中幾乎沒有受到重創，地方軍事勢力得以憑藉這一軍事系統鐵腕重建和鞏固政治秩序（頁 192–196）。

綜上所述，《廣西內戰》可以看做魏昂德近年來文革研究的集大成之作。筆者認為本書最為精彩之處，在於第二部分對屠殺的分析，魏昂德運用大量的數據進行論證，解答長久以來的疑惑——廣西之所以出現大規模的死亡，是因為未受衝擊的軍事系統有強大的執行力和組織力，將暴力貫徹到全省各地。讀者從中也不難看出，當政治秩序被當權者透過文官系統從內而外瓦解後，當權者又迅速透過軍隊重建崩潰的政治秩序。在此過程中，群眾付出了巨大代價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三、關於韋國清

正如魏昂德在研究中所示，由於中共中央留任廣西軍政首領韋國清，廣西軍區在該地區從未失勢。在駐紮南寧的野戰部隊調離後，廣西軍區所轄的地方武裝更是一家獨大，從而展開大規模鎮壓。魏昂德在論述中央為何異乎尋常地挽留韋國清時，將原因歸結為廣西地區的地緣政治——越南戰爭的形勢發展，中央讓這位曾經參與奠邊府戰役的將軍繼續掌管廣西，以顯示中方對越南的支持。此外，韋國清具有壯族身分，中共留任他，也可以表現承認該地獨特的民族構成（頁 34–35）。筆者認為，地緣政治當然是關鍵原因之一，但毛澤東（1893–1976）態度轉變的國內因素，也需考慮在內。

首先，在全國範圍內，並非只有廣西一地強調戰備和敵情險峻。如靠近臺灣的福建省，中央反覆強調，「福建可能是一個隱藏壞人不少的地方，因為對面就是臺灣嘛」。面對江蘇和浙江兩省，中央首長便說「四大家族（除了孔祥熙）都出在江浙兩省……特別是寧波，國民黨軍閥很多都是從浙江出來的，蔣介石、胡宗南（總理：陳立夫、陳果夫、戴笠等）。江蘇、浙江是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鬥爭的焦點」；而北面的黑龍江則是反對修正主義的前線，「北有蘇修、東有朝修、西有蒙修」；在西南，同樣緊鄰越南的雲南省也是「越南人民打美國帝國主義的重要後方，同時是緬甸、泰國、老撾革命人民的一個重要基地」。[10]中央對廣西地緣政治的強調並非特例，為什麼「援越抗美」的原因在廣西如此突

10 中共中央，〈關於福建問題的意見〉（1967 年 4 月 30 日）；陳伯達，〈接見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福建班的講話〉（1968 年 4 月 23 日）；周恩來等，〈接見浙江省赴京代表團時的中央講話〉（1968 年 3 月 18 日）；周恩來等，〈接見黑龍江雙方代表的講話〉（1967 年 9 月 6 日）；周恩來等，〈接見雲南省兩派赴京代表時的講話〉（1968 年 2 月 13 日），以上各文皆收入宋永毅主編，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，《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》線上資料庫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，2002；以下省略作者）。此類材料頗多，在此不一一列舉。

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出？留任韋國清有沒有其他考量？

在上述省份中，江蘇和福建的例子耐人尋味。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（1906–1985）和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（1913–1986）在文革初期所受衝擊不亞於韋國清，但是在 1967 年 8 月中後旬，他們都受到中央保護，且與韋國清一樣，獲任大軍區正職。許世友在造反形勢加劇後，被逼上大別山，直到 8 月中毛澤東接見他，否定「揪軍內一小撮」的口號後，他的境遇才好轉。[11]而對於韓先楚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（1904–1989）8 月 21 日接見韓時，還責令其「要軍區懸崖勒馬」，把發給保守派的槍收回來，「玩火必自焚」；但是 9 月 2 日再接見韓，此前在毛澤東身邊的楊成武（1914–2004）回到北京，陳伯達很快改口說：「韓先楚同志是不能打倒的，韓先楚同志與陳再道有本質區別，不能無限上綱，『打倒韓先楚』的口號我是不能接受的。」[12]中央在相近時間對兩人做出相同處置，絕非偶然，廣西的情況也是如此。周恩來（1898–1976）8 月 24 日接見廣西兩派時，還指責聯指「壓」了四・二二，批評軍區過去「支一派，壓一派」，但是 9 月 13 日即改口稱四・二二「到了犯錯誤的時候了」（頁 93–99）。如果廣西的特殊地理條件是留任韋國清的原因，為什麼毛澤東在同一時間對不同地區的軍事主官做出相同決策，而不是對廣西特殊處理呢？

筆者認為，除了考量地緣政治的因素，中央在 8 月和 9 月間態度轉向，主要是因為毛澤東對待軍隊幹部的想法改變。1967 年 7 月 20 日，武漢軍區支持的保守派衝進東湖賓館，帶走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王力（1922–1996），此時前往武漢調停的毛澤東也住在東湖賓館，被迫倉皇

11 李文卿，《近看許世友》（北京：解放軍文藝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 40–42、69–83；許世友，〈對毛澤東的匯報〉（1967 年 8 月 25 日），《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》。

12 陳伯達，〈接見廈門無產階級革命派（促聯）赴京代表團時的講話〉（1967 年 8 月 21 日）；陳伯達、楊成武，〈接見福建代表時的講話〉（1967 年 9 月 2 日），《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》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離開武漢，前往上海。[13]「武漢事件」被中央定調為反革命暴亂，各軍區首長受到大規模衝擊，造反派也在「文攻武衛」的號召下拿起槍桿，捍衛革命路線。但由於群眾間發生激烈武鬥，軍隊成為維持亂局的主要力量，毛澤東轉而拋棄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、關鋒（1919–2005），提出「還我長城」，開始支持軍隊領導人。[14]中央在 1967 年 9 月 5 日發出的命令更強調，如遇群眾組織搶奪武器，必要時「人民解放軍有權實行自衛反擊」。[15]原先受衝擊的軍隊領導在 8、9 月間重新獲得毛澤東的支持，是需要考慮的國內因素。而對於所謂的民族問題，韋國清不僅否認自己是壯族人，任內對地方主義的整肅也相當嚴厲，甚至以「壯王」、「二壯王」之名批判地方幹部。[16]他的留任可能不完全是因為戰爭的緊迫性和其壯族身分，實情為何，有待更多內部材料的揭露。

確有材料表示，1966 年文革開始後，胡志明（1890–1969）曾向中共中央提出：如果你們不要韋國清，我們歡迎他到越南來工作。[17]但中方軍事援助越南的同時，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期間（1946–1954），與越南其實存在矛盾，雙方並非合作無間。[18]外因當然是韋國清留任的因素之一，只是不應過分強調地緣政治在此中扮演的角色。

13 李作鵬，《李作鵬回憶錄》（香港：北星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 592–600。

14 唐炎明、唐亞明，《《毛主席語錄》的誕生及其他：唐平鑄文革實錄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19），頁 169。

15 中共中央、國務院、中央軍委、中央文革小組，〈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、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〉（1967 年 9 月 5 日），《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》。

16 毛澤東等，〈接見越勞第一書記黎筍談話記錄〉（1970 年 5 月 11 日），《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》；秦暉，〈「否定」並未徹底，「真相」仍待揭示——從文革中的清華與廣西談起〉，收入孫怒濤主編，《歷史拒絕遺忘——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》（香港：中國文化傳媒出版社，2015），頁 25–29。

17 錢江，《越南密戰》（北京：天地出版社，2019），頁 641。

18 Jian Chen, *Mao's China and the Cold War* (Chapel Hill: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, 2001), pp. 138–144.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四、在處遺材料之外

「處遺」即是「處理文革遺留問題」的簡稱。文革過後，中共中央曾在 1980 年代初，針對廣西文革期間的大量死亡組織了兩次調查。工作組第一次調查時，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重重阻撓，後來中央加強工作組的權力，接受政治局委員宋任窮（1909–2005）、習仲勛（1913–2002）直接領導，其正、副組長可以列席區黨委常委會，有一定決策權。「處遺材料」即是由此工作組在 1981 到 1984 年間細緻調查、整理而成。[19]而魏昂德透過分析這 18 卷處遺材料，在書中澄清了許多以往研究的問題。正如魏昂德所說，這本書是最難寫的，也是最容易寫的。難寫的地方是因為廣西出現的屠殺過於毛骨悚然，遠超他先前所知對派系衝突的敘述；而容易寫的地方，則是 1980 年代的處遺材料十分詳細地記錄了在廣西發生的事情，提供分析的基礎（頁 xiv）。

但是，只引用處遺材料也為研究帶來了些許缺憾。首先，從上文對韋國清的討論不難看出，魏昂德並無確切史料證明為何韋國清沒有下臺，僅能引用越南戰爭的二手研究論證地緣關係的緊張，推測其留任的原因。處遺材料的不足之處，在於無法看到高層對廣西問題的想法與決策。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書中對「反共救國團」和「七・三布告」的敘述，魏昂德不清楚是什麼原因導致廣西軍區上報這一似是而非的情況，把對立派打成「反共救國團」；也不了解北京究竟掌握多少情資，以至接受了廣西軍區的指控，頒布「七・三布告」。憑藉有限的材料，魏昂德只好將此歸咎於中央的領導被南寧的電報「誤導了」（頁 111–114）。

那麼跳出處遺材料，我們又能看到什麼呢？「七・三布告」首要針對的即是廣西的柳州地區。廣西黃玉梅女士曾採訪數位柳州鐵路地區（簡稱「柳鐵地區」）群眾組織的主要負責人，編寫一本柳鐵地區文革的口

19 晏樂斌，〈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〉，《炎黃春秋》2012 年第 11 期（北京），頁 13–20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述史，詳細記錄所謂搶劫援越物資的事件，以及在「七・三布告」頒布前後的活動。1968 年 5 月 21 日，柳鐵地區的四・二二組織迫於內部的主戰態度，搶奪已停在鐵路上數天的「代號車」。[20]這批貨物後來被說成是「援越物資」，實際上是當時途經柳州、準備運進附近的鳳凰軍火庫備用品。四・二二組織隨後歸還了五個炮彈車，並在 55 軍的協調下，歸還部分子彈。至於鐵路停運的問題，即使是在兩派武鬥的高峰，由蘇聯過境中國前往援助越南的物資，經中央事先通知，還是可以順利運達。7 月 19 日，中央召集廣西駐軍及兩派代表進京商議廣西問題，期間四・二二的代表可以闡述己方觀點、遞交交代材料。但是四・二二組織的成員卻在 7 月 25 日的接見中，被周恩來、康生（1898–1975）等中央領導嚴厲指斥，且隨即遭到關押，廣西四・二二就此失勢。[21]對於四・二二派的真實情況，中央高層不大可能被「誤導」，之所以做出如此決定，是因為中央需要依賴軍方盡快恢復地方秩序，建立革命委員會。[22]

這就引出了處遺材料存在的第二個問題。儘管處遺材料事無鉅細地記錄了廣西省的運動，但大多只是描述現象——如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出現了多少死亡，執行者是誰，受害者是誰——缺少親歷者的聲音。魏昂德在書中極少引用兩派參與者的回憶錄與口述材料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地方軍隊和群眾組織的參與者好像只是「十惡不赦的殺人犯」。在派系鬥爭中，他們執行命令時是什麼想法？組織內部有沒有產生分歧？聯指和四・二二派的參與者又如何看待局勢變化？這些問題是處遺材料無法解答的，也是研究的缺憾之一。上述情況可能是因社會學和歷史學

20 「代號車」一般運送危險品、易燃易爆品，貨牌不寫品名，只寫號碼。

21 楊建平，〈我的文革路〉；王反修，〈「521」事件始末和我的文革經歷〉；傅德懷，〈文革中的上書和交槍〉；邵中領，〈文革的經歷與見聞〉，以上皆收入黃玉梅，《追求與命運：造反派自述》（德州奧斯汀：美國華憶出版社，2021），頁 1–27、28–60、61–73、171–193。

22 限於篇幅，關於毛澤東在 1968 年 7 月間的決策，請參見唐少傑，〈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斷魂曲——毛澤東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〉，《二十一世紀》2006 年 10 月號（香港），頁 55–68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的學科差異，魏昂德在本書嘗試添加一些敘述性內容（如第七章），補充統計數據。此書主要是針對屠殺本身的研究，魏昂德給出了確鑿的證據與答案，筆者無意爭論材料使用的適切性，僅論及處遺材料的缺陷。

最後，處遺材料對廣西省各地區、縣、廠礦及機關單位文革情況的描述，多集中在 1969 年之前，1969 年之後的紀錄寥寥可數，這也導致魏昂德沒有述及該省 1969 年後的情況。1971 年林彪（1907–1971）墜機身亡後，全國各地掀起「批林整風」運動，主政各省的大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，許多省份的軍政首領因此遭到撤換。對此，韋國清也對自己在林彪事件中所犯的錯誤進行了檢討，但是廣西的主要矛頭卻是針對從福州新調任的區委書記韋祖珍（1912–1986）。批林整風期間，中央責成廣西處理文革期間任意殺戮情事，但韋國清卻表示：「對這個問題，只要人家不告狀，就不要把這件事再搞了，要息事寧人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就行了，四類分子被打死就算了，不作處理了」。[23] 1969 年後，其他地區群眾派性反覆，相較之下，廣西顯得有些「風平浪靜」，聯指一家獨大。何以致此呢？韋國清為何可以把攻擊矛頭轉向韋祖珍，從而穩坐第一把交椅？廣西政局在 1969 年後如何發展？書中並未給予明確解答。

誠如上述，筆者提出幾點意見，皆無損於本書精彩的論述。地方文革的樣貌難以釐清，魏昂德憑藉權威性的史料和統計分析，找出廣西為何出現大規模死亡的答案，其重要程度可見一斑。無論如何，《廣西內戰》應為了解文革期間地方派性的必讀書目之一。

（責任編輯：黃方碩　校對：廖芷青　吳昌峻）

23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編，《廣西文革大事年表》（廣西：廣西人民出版社，1990），頁 191–203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